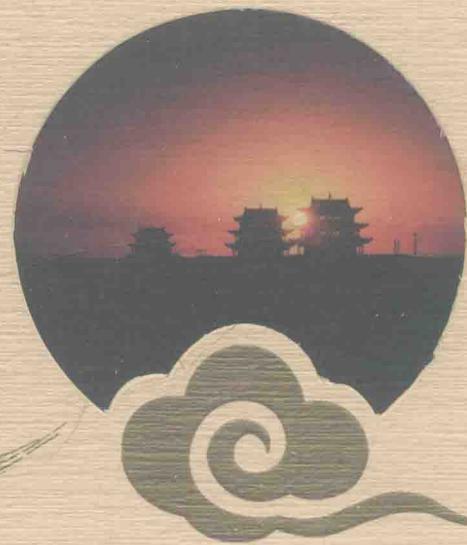


中共嘉峪关市委宣传部 甘肃省历史学会 编

嘉峪关



与丝绸之路 历史文化研究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教育出版社

嘉峪关

与丝绸之路
历史文化研究



中共嘉峪关市委宣传部 甘肃省历史学会 主编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嘉峪关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 / 中共嘉峪关市委宣传部, 甘肃省历史学会编. — 兰州 :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423-3524-1

I. ①嘉… II. ①中… ②甘… III. ①丝绸之路—对外贸易—经济史—研究—嘉峪关市—古代 IV.

①F75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08024号

嘉峪关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

中共嘉峪关市委宣传部 甘肃省历史学会 编

出版人 吉西平

责任编辑 白 鑫 李慧娟

封面设计 徐晋林

出版 甘肃教育出版社

社址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730030

网址 www.gseph.cn E-mail gseph@duzhe.cn

电话 0931-8773136 (编辑部) 0931-8773056 (发行部)

传真 0931-8773255

淘宝官方旗舰店 <http://shop11038270.taobao.com>

发 行 甘肃教育出版社 印 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3 插 页 3 字 数 376 千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 000

书 号 ISBN 978-7-5423-3524-1 定 价 65.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印厂联系: 0931-2607208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关”与“路”(代序)

嘉峪关，素有“天下第一雄关”之称，是明代万里长城西端起点。这里的人们骄傲，因为这座城市“因‘关’得名”。嘉峪关市依托1958年国家“一五”计划重点项目“酒泉钢铁公司”的建设而设市。今天的嘉峪关市是一座年轻的工业旅游城市，这里处处都有现代工业文明的烙印。从建“关”到建“市”，这个过程有清晰的历史演进脉络。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次次用事实证明，人与自然共生、人与社会和谐，人就是幸福的。而成就这一点，需要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今天嘉峪关市的发展也概莫能外。

站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新起点上，厘清众多的发展资源，我们的优势是，嘉峪关市是长城文化与丝路文化的唯一交汇地。这就是“关”与“路”。“关”指嘉峪关，“路”指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的文化意象一直以来都是明了的，那就是经济之路、外交之路、宗教之路、文化之路、民族沟通及融合之路等等。

有了这条路，农业、商业与游牧，内地与边地，亚洲与欧洲乃至东方与西方的往来就打开了方便之门。于是，“路”成为开放、交流、共进、融合的途径；“路”成为一种主动交往的姿态和诚交天下朋友的热情。

而“关”呢？仅就“嘉峪关”来说，它是明朝军事防御体系中的一部分。因此，用现代的眼光来看，隔绝的意象是非常明显的。同时，保护安定局面的用意也是再明白不过了。但这是明代的事情。进一步追溯历史，有学者指出，现在嘉峪关市城区西北10千米处的石关峡就是西汉设立的最早的玉门关。那么再联系今天我们所知道的玉门关、阳关，这些“关”或许更具有今天“口岸”的功用。当然，只是说或许。联系古今，看看今天嘉峪关周边地区的马鬃山、策克等口岸均已是商贸往来的重要场所。于是，“关”的意象就多样化了。因此，有学者指出，仅就“关”文化而言，以“嘉峪关”为中心的“关”文化所具有的价值不次于敦煌莫高窟之于东西文化。

毫无疑问，“关”是“路”上的关，“路”是“关”下的“路”。因为有了“路”，才有了各种各样的“关”。也因为有了这样那样的“关”，“路”才得以畅通和延续。“路”和“关”共同构成了交流、共进、互促的丝路文化，千百年来绵延不断，生生不息。嘉峪关市成为丝路文化和长城文化的交汇城市是历史的安排，这个城市的文化内涵借此得以丰富，历史的厚重感在这里得以突显。

不仅如此，以此为背景，这片土地上还拥有千余座古代的壁

画墓，有远古时期的黑山摩崖石刻，有号称“佛教小西天”的文殊山石窟。坐落于祁连山脚下，城市终年可见山上皑皑积雪，这本身就是奇观。城市的西南面和东北面分布着天然的戈壁峡谷和湿地，成为这座城市所拥有的自然馈赠。当然，重要的是这里的初民和汇集在这里的来自各地的三十万人口，伴随着现代文明的进步，又共同创造了属于今天的嘉峪关的现代文明，共同形成了这片土地上崭新的工业文明和现代都市文明，这又成为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这些也依然不能摆脱这一“关”一“路”的影响。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文化资源，就会孕育出什么样的时代文明，这应该是一脉相承的。

今天，站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历史起点上，嘉峪关市天然的区位特点、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内涵以及后天形成的独特的工业文明，成为支撑这座城市内涵发展的重要条件。我们迫切需要文化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的支撑点。同时，我们更需要经济发展促进文化建设，为社会提供更高水平的文明。而这些需要扎根这座城市的人们、关心这座城市发展的人们以及醉心于丝路文化、长城文化的人们，需要以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的志士们，在建设文化强国、甘肃省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过程中，共同探讨、不断谋划、合理布局。

基于此，我们与甘肃省历史学会联系沟通，以“嘉峪关”“丝绸之路”为内容，开展文化研究，联合举办了“嘉峪关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希望借全省历史工作者的智力，共同为

嘉峪关文化发展、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整合时代发展、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知灼见。但愿我们的些许努力能够为这座城市的发展有所裨益。感谢甘肃省历史学会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

《嘉峪关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

编委会

2015年6月

目 录

论清代嘉峪关职能的演变	杨代成 王希隆(001)
玉门关历史变迁考	李并成(010)
嘉峪关城与甘肃的长城文化	刘再聪(021)
嘉峪关监督考述	张连银(033)
从“关限”至“废垒”——明至民国嘉峪关意象变迁研究	僧海霞(041)
嘉峪关关城南闸门考	张斌(054)
明代嘉峪关的修筑及与周边游牧民族的边防关系	许海军(065)
丝绸之路与中国古代外交	许淳熙(069)
《肃镇华夷志》之“西域疆里”考	张晓东(075)
西北铁器时代早期区域文化互动与丝绸之路的形成过程	苏海洋(081)
河西走廊及其周边史前文化交流与“前丝绸之路”河西段的形成	周晓聪(099)
丝绸之路陇右段十六国时期经济的曲折发展	张琳 毛雨辰(112)
甘肃丝绸之路文化带开发利用研究	金蓉 谢羽(121)
陇商:一个待解的命题	尚季芳(129)
认识保护两关文化 传承创新华夏文明	潘竟虎 潘发俊(132)
嘉峪关旅游景区主题定位及其产品开发研究	李海军(143)
嘉峪关丝路文化旅游业发展的契机	柳君君(147)
丝绸之路黄金段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 ——以黑山岩画为例	侯凌静(152)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	常洁琨(156)

先秦时期河西走廊一带文化发展序列及其特征	陶兴华(168)
民国年间活跃于丝绸之路上的保安族商人	连菊霞(180)
敦煌俗讲变文对民众的文化教育作用	王睿颖(182)
嘉峪关魏晋墓出土伏羲女娲图像考析	王春梅(190)
浅述魏晋墓壁画砖反映的丝路文化	杨殿刚(196)
魏晋十六国嘉峪关地区民众饮食结构及其成因探析 ——以嘉峪关新城魏晋墓砖壁画为例	王琦儒(201)
早期道教羽化成仙思想的生动再现 ——甘肃省金昌市博物馆馆藏晋代彩绘画像砖	李勇杰(205)
内迁与整合 ——魏晋时期入迁河西走廊移民的历史考察	黄兆宏 张相鹏(213)
河西四郡及其战略地位论要	雍际春(232)
汉魏时期对河西地区的民族管辖与治理	黎树科(241)
汉简所见河西窦融集团的“毋嫁娶过令”	侯宗辉 马东平(251)
五凉郡守诸问题考述	贾小军(260)
十六国北朝时期河陇地区石窟寺的分布特征	杨发鹏(270)
略谈前凉屯田与“治石田”的重要作用	张振华(281)
唐五代河西走廊西域胡人职业分布探析	杨 芳(287)
新出唐吐谷浑王族慕容环墓志研究	陈 玮(298)
关于西夏政区“西经略司”“西路”及“路”的几个问题 ——从武威西郊西夏墓墓葬题记谈起	于光建(313)
西夏元时期黑河流域绿洲开发的人文驱动因素研究 史志林 董 斌 汪桂生 杨谊时(319)	
关于嘉峪关市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城市定位 和发展方向问题的思考	陈秉刚(332)
丝绸之路甘肃段的历史地位及文化遗存的价值 杜养惠 张 弛(342)	
五凉时期河西民族融合论析	秦丙坤 刘 琴(350)

论清代嘉峪关职能的演变

杨代成 王希隆
(兰州大学)

坐落于河西走廊中部的嘉峪关(今嘉峪关市向西5千米)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要冲。嘉峪关不仅在我国的对外经济文化交往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军事方面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嘉峪关因嘉峪山而得名。嘉峪山是祁连山北麓坡地的一条支脉,由东南向西北蜿蜒。嘉峪山中段有东西二峰,其中西峰即与嘉峪关南北相望,并立于大漠之上。正所谓“南凭红山祁连,北依黑山嘉峪,关居适中,深隐固闭,险峻天成”^①。

一、明代的嘉峪关

明洪武年初年,宋国公冯胜进军河西,追歼元朝残部,于甘州大破元军,并进军肃州,直达居延,基本收复了河西地区。为巩固明朝的西北边防,朱元璋命冯胜在河西建关设防。冯胜在实地考察后,选定了建关地址。冯胜凯旋后,经过当地军民的共同努力,在嘉峪山麓以西的隘口津要,嘉峪关城终于拔地而起。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隶属肃州卫的嘉峪关正式建立,设游击、千总、把总及马战兵、步战兵和守兵扼守嘉峪关。

明初,明朝势力一度西进至哈密绿洲,于嘉峪关以西设置了关西七卫,加强了对嘉峪关以西至哈密地区的统治。但成化以后,吐鲁番兴起,占据哈密,侵扰关西,七卫残破,不能自立,大部人众相继迁入关内^②。

此时的明朝疆域,“东起辽海,西至嘉峪,南至琼、崖,北抵云、朔,东西万余里,南北万里”^③。明帝国也就因之建立了“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④的防御体系。正像学者们指出的那样:“随着王朝疆界

^①高凤山《嘉峪关》,《甘肃社会科学》,1980年,第4期。

^②高自厚《明代关西七卫及其东迁》,《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

^③《明史》卷四〇,地理一,第882页。

^④《明史》卷九一,兵三,第2235页。

的东移,嘉峪关在明王朝边疆防御体系中日渐重要。关西七卫失守后,明王朝弃关外之地,嘉峪关沦为极边,被视为‘关限华夷’。”^①为了抵御吐鲁番的侵扰与管理西域中亚各地方政权与明朝的通贡贸易活动,明朝多次对成为“极边”关隘的嘉峪关进行了整修、扩建,最终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防御体系^②。作为明长城的最西端,嘉峪关以其重要的军事防御功能被时人誉为“河西第一巨防”。

明代嘉峪关作为边关,其主要的职能当然是抵御外族入侵。但作为毗邻西域的边镇,嘉峪关也起着管理西域诸国与明朝朝贡贸易活动的作用。

实际上,“从哈密到嘉峪关一线,是西域贡使前往明代中国唯一的法定路线,嘉峪关是他们进入明朝的唯一关口。所有的贡使都必须在嘉峪关接受甘肃镇守臣的审验后,方能合法地进入中国”^③。

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明代嘉峪关主要有两个重要职能,即抵御外部入侵;管理西域中亚各地方政权的朝贡贸易活动。

二、清代的嘉峪关

清代嘉峪关职能的演变主要包括两个阶段,即前期,顺治元年至乾隆二十二年(1644—1757年);中后期,乾隆二十三年至宣统三年(1758—1912年)。笔者将于下文分阶段叙述。

第一阶段,明亡清兴,顺治二年(1645年),肃州为清军攻占,同年,嘉峪关设绿营一营,置守备一员,归肃州镇总兵统辖^④。但是,清朝在河西军政建制上并没有大的改动,只是因袭明代卫所旧制。而自明中叶河西形成的中原王朝划嘉峪关而治的局面,在清初并无变化^⑤。究其原因,正是因为“清廷定鼎北京后,致力于对中原的控制,嘉峪关外无暇经营”^⑥。

① 僧海霞《从“关限”至“废垒”:明至民国嘉峪关的意向变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1期。

② 武沫《甘肃通史·明清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1页。

③ 田澍、何玉红《西北边疆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18页。

④ 《清史稿》卷一三一,兵二,第3918页。

⑤ 王希隆《吐鲁番察合台后裔与清朝》,《西北少数民族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95页。

⑥ 王希隆《清代关西五卫述论》,《西北少数民族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418页。

其后，随着内地统治的日益巩固，清朝的视线开始转向西北地区。作为河西“重险”嘉峪的嘉峪关自然受到重视^①。

康熙五年“厄鲁特蒙古徙牧大草滩，慰遣之。不受命，战于定羌庙，败去，扬言将分道入边为寇。思克与提督张勇疏请用兵，廷议不可轻启兵衅，令严防边境，抚恤番人。”清朝出于力量对比的考虑，拒绝了用兵之请。康熙六年，“思克乃僭勇修筑边墙，首扁都口西水关，至嘉峪关止，于是厄鲁特蒙古入边牧者皆徙走”^②。至此，清代以嘉峪关为依托的河西军事防御体系初步确立。

康熙十三年，在嘉峪关设游击，“兼辖野麻湾、新城、金佛寺、卯来泉四堡”^③。嘉峪关的军事统帅由顺治二年的守备提升至游击，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嘉峪关军事地位的日益重要。

康熙三十年，甘肃提督孙思克上奏：“噶尔丹巢距边月余，从子策妄阿喇布坦虽交恶，恐复合，有侵青海举，道必经嘉峪关外。肃州密迩青海，请设兵三千为备。”^④嘉峪关驻军进一步增多。

“嘉峪关为西域东陲”^⑤的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随着哈密额贝都拉的归顺，清朝建立了哈密扎萨克旗，这标志着“清朝的行政管辖达到了新疆东部，明代中期以来闭嘉峪关自守的局面开始改变”^⑥。虽然此时的嘉峪关不再处于清准交锋的第一线，但其军事职能并未降低。

有清一代，丝绸之路仍然是沟通西北地区的交通大动脉，陕、甘、青、新主要驿道干线都是沿丝绸之路形成的。这条驿道干线东起豫、晋、陕三省交界处的潼关，经西安，过咸阳，由醴泉、乾州、彬县、长武而达于陕甘交界之窑店。入甘肃后，经泾川、平凉、静宁、会宁、安定到达兰州。由兰州出发，渡黄河西行，经平番、凉州、山丹、甘州、肃州出嘉峪关，再往西行即达安西州，穿过茫茫戈壁，到新疆东部重镇哈密。清前期，自北京至嘉峪关设有皇华驿普通快马驿站和捷报处急用飞递军台两路驿站。为了转输军需物资，传递军情文报，清朝在嘉峪关外设置军台、驿站，将两路驿站延伸至

^①《清史稿》卷六四，地理一一，第2110页。

^②《清史稿》卷二五五，第9782页。

^③《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二七九，《肃州直隶州·关隘》。

^④《清史稿》卷五二二，第14450页。

^⑤《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八，《疆域一》。

^⑥王希隆《新疆哈密维吾尔族中的札萨克旗制》，《西北少数民族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250页。

巴里坤军营。正因为如此,丝绸之路的要冲——嘉峪关成了清朝驻西域军队的生命线,受到清朝的高度重视。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准部进犯哈密,清朝急调大军往援,于巴里坤设立大营,屯驻八旗、绿营官兵,积极筹备对准作战。这样,作为内地与新疆屯军联系的必经之路,嘉峪关更加受到重视。清朝为了供给前方大军的用粮和物资,调取粮车三千辆,招募车夫九千名,“自嘉峪关至哈密,安设十二台,每台各分车二百五十辆,令其陆续转运”^①。

雍正七年,为了适应对准部作战,特别是后勤保障方面的需求,清朝设肃州直隶州,嘉峪关隶属之。

以上,我们可以看出,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主要是出于与准部对抗的需要,嘉峪关的军事地位不断提高。实际上,这也是这一时期河西地区军事地位提高的表现之一。“河西不过两千里之地,清前期竟置提督二、总兵二、将军一、副都统二,这种军事建制在清代是少见的,反映出清前期河西军事地位的提高。”^②

当然,这一时期嘉峪关的职能不仅仅是军事方面。它依然像明朝时那样,承担着控制朝贡贸易的职能。西域诸国的贡使在同清方人员评定物价之后,都要“于嘉峪关盘验稽查,量定税则抽税”^③。但是相较于军事职能,控制朝贡贸易的职能无疑地只能处于第二位。

第二阶段,清代嘉峪关职能演变的重要分界线即是乾隆二十二年七月,清军最终击溃阿睦尔撒纳,收复新疆。自乾隆二十三年后,嘉峪关的职能较之以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是因为这种职能的演变,嘉峪关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平定准部不久,乾隆皇帝即谕军机大臣:“今大功告成。巴里坤以西。皆成内地。”^④嘉峪关从“沿边屏障”一变而成为“腹地要冲”,其面临的军事压力明显减小。以嘉峪关为首的军事防御体系作用递减。由于“新疆外包,此为腹里,从前隘防,斥堠似无所用”^⑤。清朝因此放弃了对嘉峪关一带

①《清实录·圣祖实录(三)》卷二六七,康熙五十五年正月辛酉条,中华书局,1985年,第620页。

②王希隆《清代前期河西兴盛原因初探》,《西北少数民族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414页。

③《清高宗实录》卷四九四,乾隆二十年八月庚戌。

④《清实录·高宗实录(九)》卷六七七,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甲寅条,中华书局,1986年,第575页。

⑤吴人寿《肃州新志稿》,《隘防》。

边墙的修复。但是,嘉峪关作为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会有众多的来往商旅、行人,或者是藩部贡使经过,旧有的城楼规模局促,对于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朝来说,实在是有碍观瞻。因此,清朝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四十四年(1779年)两次修筑嘉峪关城楼。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重修嘉峪关城内戏楼。嘉庆十二年(1807年),重修关帝庙。从修缮对象的嬗变,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嘉峪关的军事防御功能逐渐弱化。后来陶保廉曾言:“其南边墙起自外城西南隅,北边墙起自外城东北隅。倾圮殆尽,间有烽台遗址,仅可辨识。”^①在放弃修缮边墙的同时,河西地区,包括嘉峪关驻扎的八旗、绿营部队,纷纷调防、裁撤,并允许汉军旗下旗丁出旗。嘉庆以后,嘉峪关守兵更是大为减少。嘉峪关的军事防御职能基本丧失。嘉峪关军事地位的下降,反映了清代边疆开拓的创举。清人也为之骄傲不已,正所谓:“视前朝支吾补缀之苦,相去天渊。”^②

嘉峪关的军事地位,特别是军事防御重要性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嘉峪关的衰落。这一时期嘉峪关的交通要冲地位依然十分重要,其经济地位也有所上升。

“清朝收复西域后,王朝疆界西移,西域处于王朝控制之下,但因局势不稳,时有动乱之虞。为更有效地控制,加强对出入关人员的盘查是重要手段。”^③乾隆四十年,清朝在嘉峪关设置巡检^④。嘉峪关巡检的设置,使嘉峪关成了新疆与内地交流的重要关卡。此时的嘉峪关虽然已属于内地,但关城依旧照例经常关闭,出入关者验明正身方可放行。嘉峪关“武营把总司启闭掌锁钥,麾旗鸣炮,日凡三次。以文员巡检盘诘,异言异服诘出入最为严禁”^⑤。此后官员和民人出入关,都需要接受嘉峪关司关官吏盘查。这种严格的审查制度,直到光绪年间也依然实行。清代文人对这一审查制度,多有记载。

祁韵士出关,曾记“又丁坝西行,四十里至嘉峪关。关距肃州七十里。民人出关者,须自州给票,始得放行。此外,亦须检验公文,乃定例也”^⑥。

^①陶保廉著、刘满点校《辛卯侍行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27页。

^②吴人寿《肃州新志稿》,《军政》。

^③僧海霞《从“关限”至“废垒”:明至民国嘉峪关的意向变迁》。

^④《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二七九,《肃州直隶州·关隘》。

^⑤吴人寿《肃州新志稿》,《隘防》。

^⑥祁韵士《万里行程记》,方希孟著、李正宇等点校《西征续录》,第16页。

洪亮吉出关：“嘉庆四年（1799年）十二月初五日……已刻，行七十里宿嘉峪城外东关，新月乍上。巡检山阴高词来谒。”^①

林则徐在入疆时也曾记：“又五里至嘉峪关，宿关之城外驿舍。昨夕，司关官吏来问所带仆从及车夫姓名，告以人数。”^②

左宗棠平定西北时，驻军肃州，其下属也曾接受盘查：“今关有内外城，稽查甚严，行旅过此，必以人数登册达大府。余承左相给传牌，得遄行无阻。”^③

当然，清朝设巡检于嘉峪关，不仅仅是为了盘查出关人员，更是为了防止迁入新疆的各类人员逃亡。自康熙年间，清朝即将罪犯发至甘肃河西、新疆地区屯田，平定准部后，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强，嘉峪关外直至新疆成了发遣全国应拟军流罪犯的要地。^④

由于关口盘查过于严格，使得“在关外立业者，既愿招致亲朋；内地无田可种者，亦颇相携出门，乃皆阻于一关，未免趑趄不前”^⑤。乾隆三十七年，陕甘总督文绥上《陈嘉峪关情形疏》：“往时嘉峪关恒闭，过者候讯察，今关外已同内地，请令辰开酉闭。”^⑥清朝同意了他的建议，实行了“进关者仍行盘诘，出关者听其前往，不得阻遏农民”的政策。可见，为了促进移民的增长，清朝不仅严防已迁入新疆者外逃，也适当放宽了对内地商旅、民人入疆的审查。

清代是河西高速发展的时期，该地区出现了兴盛的局面，经济、人口都有较大的发展。正如王希隆所言：“河西的兴盛已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⑦嘉峪关处在这样的潮流中，自然获益颇丰。

^① 洪亮吉《伊犁日记》，杨建新主编《古西行记选注》，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66页。

^② 林则徐《荷戈纪程》，方希孟著、李正宇等点校《西征续录》，第51页。

^③ 冯焌光《西行日记》，周希武著、王晶波点校《宁海纪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3页。

^④ 王希隆《清代西北的犯屯》，《西北少数民族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453页。

^⑤ 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八一，《兵政十二·边防下》。

^⑥ 《清史稿》卷三三二，第10968年页。

^⑦ 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八一，《兵政十二·边防下》。

^⑧ 王希隆《清代前期河西兴盛原因初探》。

清代中原至新疆重要商路之一也就是古代的丝绸之路。这条商路一般从西安经兰州、嘉峪关、玉门至哈密，多用四马大车运货，每车载1000公斤，运费昂贵，沿途多关卡，行程需5个月左右。清初，吐鲁番的棉花、葡萄，准噶尔部的羊、马、骆驼、羚羊角以及南疆的玉石等正是经此路运往兰州、包头、京津一带。

新疆统一后，内地川、陕、江、浙诸省商贾纷纷由丝绸之路出关贸易，天山南北诸城“商贾辐辏，贸贩鳞集”。内地大批贸易物资如茶叶、丝绸、棉布、瓷器、药材等主要是经由河西运往新疆、新疆、中亚各地的牛马、毛皮、土产品等也主要经由河西运往内地。河西成为连接内地与新疆、中亚各地的通道，交通地位倍显重要。清末凉州之“大宗输入品为京洋杂、绸缎、海菜等，皆由省城转运，分销本境者十之二三，发运新疆者十之七八”^①。虽然新疆各地相继建立贸易点，使得嘉峪关失去了以往控制西域各国朝贡贸易的作用。但是盘查往来商旅、行人，征收关税成为嘉峪关最为主要的职能^②。嘉峪关的经济也由此获得较大发展。

清代中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新疆、对俄国贸易的发展，清廷对货物流通中的税收进一步加强，嘉峪关逐渐成为控制东路贸易的主要关卡。嘉庆四年（1799年），清朝弛玉石之禁，准叶尔羌、和阗等地玉石、玉器入嘉峪关，但必须按额纳税，若漏税，五钱以上罚一倍，一两以上罚两倍，二两以上罚三倍^③。嘉庆十九年（1814年），关外吐鲁番种棉花日广并大量贩运进关，清朝即令试于“商贩经处所，如嘉峪关等处，酌量收税”^④。道光八年（1828年），清朝又在嘉峪关设立了茶务稽查局，稽查官、私商人售茶价格，收缴茶税。

光绪七年（1881年）正月二十六日，中俄《伊犁条约》签订，清朝在俄国的压力下准俄商赴嘉峪关贸易，丝绸之路上的要冲嘉峪关至此成为通商口岸^⑤。清朝给予俄国诸多特权如改定俄陆路商约，允许俄货“至嘉峪关，照天津关例，纳三分减一之税，再运内地，纳税亦视天津例”^⑥。正是因

^①彭英甲《陇右纪实录》卷八，甘肃官报局，1911年，甘肃省图书馆藏。

^②田澍、何玉红《西北边疆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40页。

^③《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四六，《杂征》。

^④《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九，《征榷一》。

^⑤王希隆《中俄关系史略》，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272页。

^⑥《清史稿》卷一二五，实货六，第3689页。

为俄国享有协定出入口税则、减税或免税等特权，这也就为其大量向中国西北倾销商品提供有利条件。嘉峪关成为清人所谓“洋关”也就是通商口岸后，“城内驻扎游击巡检，有税厂，空车过取四百文，骆、马二百文，人一百文，同行十余车，开箱细查，无私货乃免”^①。成为通商口岸的嘉峪关，盘查更胜于以往。随着印度、日本、越南等地茶叶种植的兴起，清朝对西方国家的茶叶出口有了一定程度的衰退，但对俄国继续保持较大量的茶叶出口。“其专尚华茶取用宏多者惟俄。盖自哈萨克、浩罕诸部新属于彼，地加广，人加众，需物加多，而茶尤为所赖。光绪七年定约，允以嘉峪关为通商口岸，而往来益盛。十年后我国运往之茶，居全数三之一。”^②

内地与新疆地区贸易的增长，俄国加紧向中国西北倾销货物，这都加速了嘉峪关的发展。但是，同治朝的社会动乱使得嘉峪关受到较大的破坏，嘉峪关街市原本“铺户、楼房、茶肆、酒肆、旅店、牙行约千余户，军民数千家。变乱后，庐舍零落，仅存十余椽”^③。嘉峪关在动乱之前曾经是仕宦商放出口入关必宿之地，战后虽然“客路畅通，西域行旅络绎不绝，列肆陈货者亦渐来集，但未能如旧尔”^④。

晚清的嘉峪关在通信、邮传方面也占有重要地位。光绪年间，清朝“设西安至嘉峪关电线”^⑤。不久后的光绪十九年八月，清朝又架设了嘉峪关至迪化的电报线路^⑥。这样就形成了纵贯西北地区的电报干线。这对于西北地区的国防以及与内地的信息联系都具有重要作用。新疆巡抚潘效苏曾于光绪二十九年试办自迪化经哈密到肃州的邮政。由于经营不善，亏损严重，三年后停办。因而新疆邮政业务逐渐为俄国人把持。宣统元年，新疆地方政府任比利时人彼得森为邮务总办，开设了迪化—奇台—嘉峪关邮路。通过电报、邮政线路，嘉峪关成为沟通新疆与内地信息联通的重要纽带。

三、结论

嘉峪关由明代抵御蒙古、回部的边关重镇，至清代一变为清朝收复西域并维护西部地区稳定的重要后方基地与交通纽带，这正反映了清代相

①裴景福著、杨晓靄点校《河海昆仑录》，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31页。

②《清史稿》，卷一二四，实货五，第3663页。

③吴人寿《肃州新志稿》，《隘防》。

④《重修肃州新志》之《肃州》，第11册，《关隘》。

⑤《清史稿》卷二三，德宗本纪一，第895页。

⑥尹伟先、马啸《西北通史·第四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46页。